

□ 中朝韩日关系研究

渤海国药事发微

苗 威 赵振成

[摘 要] 中国正史及日本文献保存有大量关于渤海国的医药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考察与分析可知,渤海国医药受周边地区医药文化影响极大,其药方的配比及使用,皆有明确的中原医药的影响成分。这表明渤海国医药事业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是“宪象中国”的鲜明个案之一。

[关键词] 渤海国;药;中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专项(17VGB005)

[收稿日期] 2018-05-30

[文章编号] 1009-3311(2018)05-0036-09

[作者简介] 苗威,通化师范学院长白山学者特聘教授(通化 134000);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威海 264209);赵振成,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硕士(长春 130024)。

DOI:10.16154/j.cnki.cn22-1025/c.2018.05.005

中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世界,尤其是东亚诸国影响深远。伴随着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东亚区域秩序的建构,汉字文化圈渐扩渐大并日趋成熟,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厚底蕴的中药知识在九服之地得到广泛受容。⁷ 世纪末建国的渤海国积极“宪象中国”,全面借鉴并使用中医药知识,极大地推动了中药在渤海国乃至东北亚地区的应用以及发展。对于渤海国的中药研究虽然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①但研究空间巨大。本文欲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和考证渤海国的药事情况,以求教于诸位方家。

一、渤海国的地产药材

渤海国地处唐朝东北地区,其地濒临日本海,气候寒冷,多产一些珍奇鸟兽、文石、药材等,^②这些物品常常成为其通使或朝贡于中原王朝的特殊贵重物品,而中药就是其中一项。

① 孟庆瑛、吴庆军:《东北地区中药机构设置初探》,《黑龙江医药》1996年第6期;胡梧挺:《“含生草”与“鞞羯”:渤海国相关史料的讨论》,《哈尔滨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梁玉多:《渤海国经济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辛时代:《也谈渤海国物产太白山之“菟”》,孙炜冉主编:《高句丽与东北民族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8年;胡梧挺:《渤海国道地药材与东亚医药交流——以渤海人参为中心》,《北方文物》2018年第1期。

②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7《食货考》,长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第380页。

(一)渤海国地产药的分布

渤海国幅员辽阔,“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地方五千里”。^① 总体来看:三江平原铺陈于北部,锡霍特山区绵延于东部,松嫩平原铺陈于西部,长白山山脉、张广才岭横亘于中南部,因其地域广袤,南北东西相去较远,地形复杂,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② 可以说其内部地理资源丰富,中药的种类繁多,产量丰富,其来源有植物、动物和矿物等,由于中药多采用草本植物为原料,所以关于记载渤海国中药的书籍大多数被称为“本草”。对中药的认知及应用充分反映了渤海国历史、文化、自然资源等方面的特点,即渤海国充分吸收了中原文化中的中药学、中医学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

渤海国所产的中药或药饵南北皆有,中药一般是本草类,少数是兽类,还有个别矿物质类,而药饵一般是矿物质类的。在渤海中南部的长白山山区盛产中草药,其地属温带季风性气候,四季分明,因其山体南北坡及山区局部气候的不同,其生长的草药种类和时间也不同,可在一年四季均产中草药,一直以来都是渤海国对中原及与东亚诸国或民族中药贸易的产地之一;在其北部的黑水部所盛产的牛黄、人参、头发等同样见于史籍之中。

因此,渤海国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广袤的土地孕育了各种地产中药,中药也成为渤海国及其留在此地的后代居民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可再生的资源之一。

(二)渤海地产药的种类

唐朝及五代时期(618—978),东亚地区医药文化交流更进一步发展,唐朝周边民族及国外的文化不断输入,药品输入数目也日益增加,进一步丰富了中药学及方剂学的发展。唐朝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主持编修系列的医药书籍,^③ 这些书籍不仅收录了其本土中药,也收录了外来药物品种。在其医药书籍及新、旧《唐书》中,对其周边民族或国家的物产记载尤为详细,渤海国作为唐朝的藩属国之一,对渤海国物产包括中药及与之发生的中药贸易情况亦有记录。

渤海国中药的使用具有文献依据,《新唐书·渤海传》中对于渤海国的特产中药有着非常详细的描述,其云:渤海“俗所贵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④ 其中,太白山所产的“菟”即是中药材“菟丝子”,^⑤ 据《本草纲目》记载:主治“续绝伤,补不足,益气力,肥健人”。^⑥ 可见,“菟丝子”具有平补肾、肝、脾等的药用价值,主要应用于肾虚腰痛、尿频、目暗便溏等肾阴阳虚之证,被历代医书所记载。又据《名医别录》云:菟丝子“生朝鲜田野,蔓延草木之上”。^⑦ 因此,此种中药遍布于辽东及朝鲜半岛一带,而渤海南海府处于朝鲜半岛东北部,可以推断出渤海国产“菟丝子”这味中药。

金毓黻在《渤海国志长编·食货考》中云,渤海国所产诸药之品类至繁,其朝聘物品有:人参、昆

① 《新唐书》卷 219《渤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6180 页。

② 孙倩:《试论唐代渤海国的疆域、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经济布局》,《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 年 1 期。

③ [唐]苏敬:《新修本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唐]陈藏器:《本草拾遗》,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年;[唐]孙思邈:《千金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 年;[唐]孟诜:《食疗本草》,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五代]李珣:《海药本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 年。

④ 《新唐书》卷 219《渤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6183 页。

⑤ 辛时代:《也谈渤海国物产太白山之“菟”》,孙炜冉主编:《高句丽与东北民族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8 年。

⑥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 18《菟丝子》,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年,第 1236 页。

⑦ [梁]陶弘景著、尚志钧辑校:《名医别录》卷 1《昆布》,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 年,第 41 页。

布、牛黄、头发、黄明、白附子、麝香、蜜等皆属于中药。^①其中的人参,据《本草纲目》记载:“(人参)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②可见,人参具有补气固脱、健脾益肺、宁心益智、养血生津等多重功效,适宜多种病人的治疗,备受医药经典所青睐。关于人参的产地,在《名医别录》中有记载:“生上党及辽东”。^③“人参”的主要产地之一在辽东一带,按照古人的地理空间概念,渤海国的主体疆域是在辽东地区。另据《渤海国志长编》记载:“大兴二年(739年),以人参聘于日本。末王十九年(925年)及二十年(926年),皆贡人参于后唐。黑水部亦贡人参于唐。”^④因此,渤海国盛产“人参”,不论其地南北,多次以“人参”作为其朝贡的特产。

渤海国所产的“昆布”亦是一味知名的中药,据《本草纲目》记载:主治“十二种水肿,癭瘤聚结气,瘰疬”,^⑤具有软坚散结、消痰、利水之功能。对于“昆布”的产地多有记载。成书于梁朝的《名医别录》云:“(昆布)味咸,寒,无毒……生东海。”^⑥《本草纲目》依据所收录的唐朝时期陈藏器的《本草拾遗》曰:“昆布生南海,叶如手,大似薄苇,紫赤色,其细叶者,海藻也。”^⑦前者认为“昆布”的产地在东海地区;后者则认为是“南海”,这里的所谓“南海”,是指渤海国的南海府,该地区邻近东海,即今日本海,所以从地理上讲,二者所指是不矛盾的。昆布是咸水植物,在大陆架附近生长,今天日本海西岸,即渤海国的南海府东部沿海一带,仍然有昆布出产。《名医别录》与《本草拾遗》两书所指“昆布”产地具有一致性。另据《册府元龟》记载:渤海大兴三年(740年),贡唐于昆布;末王十七年(923年)及二十年(926年),贡昆布于后唐。^⑧可见,渤海国曾经将“昆布”作为特产朝贡中原王朝。

“牛黄”是牛肝胆的病理产物,是珍贵的动物药,主要来源是牛科动物黄牛、水牛的胆管、肝管中的结石。其主要产于东北,被称为“东北黄”或“东黄”。^⑨据《本草纲目》记载:“(牛黄)惊痫寒热,热盛狂瘵,除邪逐鬼。”^⑩可知,“牛黄”的主要药用是清热凉肝、息风止痉,镇静、镇痛、解热、抗惊厥等。据载,大兴十一年(748年),“黑水部贡牛黄于唐”。^⑪渤海灭亡之后,其遗部的贡物中仍可见到“牛”,比如大安三年(1087年),“西北渤海部进牛”。^⑫从渤海西北部、东女真等地距离中原的距离来判断,长途跋涉进贡动物牛并没有必要,这里的“牛”,我们认为是代指“牛黄”。因此,渤海国域内是产“牛黄”这种中药。

“头发”又名“血余”,可作为中药,《本草纲目》记载:头发曰血余,又曰人退。可入药治诸症。^⑬另据《名医别录》记载,其主治“咳嗽,五淋,大小便不通,小儿惊痫,止血鼻衄,烧之吹内立已”。^⑭因此,“头发”具有止血、化痰、利尿等功效。“头发”作为一味中药,其供应地亦有记载,据《渤海国志长

①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长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第380—390页。

②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12《人参》,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第701页。

③ [梁]陶弘景著,尚志钧辑校:《名医别录》卷1《人参》,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年,第24页。

④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7《食货考》,长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第389页。

⑤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19《昆布》,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第1377页。

⑥ [梁]陶弘景著,尚志钧辑校:《名医别录》卷1《昆布》,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年,第130页。

⑦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19《昆布》,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第1377页。

⑧ 《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11、11421页。

⑨ 杨明珍、迟程、迟萍:《中国牛黄43年(1949—1992年)研究动态》,《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1996年第1期,第27—35页。

⑩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50《牛黄》,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第2800页。

⑪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7《食货考》,长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第389页。

⑫ 《辽史》卷69《部族表》,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13页。

⑬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52《乱发》,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第2929页。

⑭ [梁]陶弘景著,尚志钧辑校:《名医别录》卷1《菟丝子》,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年,第61页。

编》记载：“大兴十一年（748年），黑水部曾贡头发于唐。末王二十年（926年），渤海补贡发于后唐。”^①因此，“头发”作为其地特产用于朝贡中原王朝，具有入药的价值。

渤海国的朝贡物品“黄明”，有可能是“黄明胶”。^②《本草纲目》对“黄明胶”记载：主治“吐血、衄血、下血、血淋下痢，妊妇胎动血下，风湿走注疼痛，打扑损伤，汤火灼疮，一切痈疽肿毒，活血止痛，润燥，利大小肠。”^③可见，“黄明胶”具有滋阴润燥，养血止血等功效，用于体虚便秘等。据《渤海国志长编》记载：“末王十九年（925年），遣裴璆贡黄明于后唐。”^④因此，渤海国很可能用“黄明胶”这种特产中药朝贡于中原王朝。

“白附子”作为渤海国重要的特产之一，据《本草纲目》记载：主治“心痛血痹，面上百病，行药势。”^⑤因此，“白附子”具有祛风痰、定惊搐、解毒散结、止痛等功效。又据《渤海国志长编》记载：“末王二十年（926年），贡白附子于后唐”。^⑥因此，渤海国以此种特产中药朝贡于中原王朝；另据《契丹国志》记载：白附子，为熟女真地产，女真所据之地即渤海国故地也。^⑦可见，渤海国产“白附子”这种中药。

“麝香”是渤海国又一特产。据《名医别录》记载：“主治诸凶邪鬼气，中恶，心腹暴痛胀急，痞满，风毒，妇人难产，堕胎，去面，目，中肤翳。”^⑧因此，“麝香”具有开窍醒神、活血通经、消肿止痛、催产等功效。“麝香”作为其渤海国重要地产中药之一，被《光绪吉林通志》记录下来：“麝，形似麝一名香麝喜食柏，脐血入药名麝香。”^⑨渤海人对于麝香的使用，在对外交聘中使用较为普遍，比如，玄锡六年（876年），“聘日本使杨中远曾携麝香以赠人”。^⑩因此，渤海国拥有“麝香”这种中药，且很有可能用于海外贸易交流之中。

“蜂蜜”亦是渤海国又一地产中药之一。据《本草纲目》记载：主治“风头，除蛊毒，补虚羸伤中。久服令人光泽，好颜色，不老。”^⑪因此，“蜂蜜”具有滋阴润燥、补虚润肺、解毒、调和诸药等功用。从文献中也可知渤海国产“蜂蜜”，据吴振臣的《宁古塔纪略》记载，渤海人初时“不知养蜂蜜”，^⑫但随着采摘业的发展，“有采松子者或采樵者于枯树中得蜂窝，其蜜无数，汉人教以煎熬之法，始有蜜”。^⑬大兴二十七年（764年），“使臣以蜜聘于日本”。^⑭因此，依据材料渤海国不仅仅在贸易交流中有“蜂蜜”这种特产中药，从其后人的采集“蜂蜜”技术中，也能看出深受中原地区采蜜传统的影响。总之，在渤海国的地方物产中，中药是重要且特殊的一项，渤海不仅自己使用，同时也将其用于对唐朝贡以及同日本等的交往中。由于中药产量大、品质好，在古代东亚久负盛名。

①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 17《食货考》，长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 年，第 389 页。

②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 17《食货考》，长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 年，第 390 页。

③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 50《黄明胶》，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年，第 2797 页。

④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 17《食货考》，长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 年，第 390 页。

⑤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 17《白附子》，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年，第 1184 页。

⑥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 17《食货考》，长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 年，第 390 页。

⑦ 《契丹国志》卷 26《女真国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 236—238 页。

⑧ [梁]陶弘景著、尚志钧辑校：《名医别录》卷 1《麝香》，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 年，第 60 页。

⑨ [清]长顺、讷钦修，李桂林、顾云纂：《光绪吉林通志（一）》，《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吉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年，第 625 页。

⑩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 17《食货考》，长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 年，第 390 页。

⑪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 39《蜂蜜》，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年，第 2225 页。

⑫ 李兴盛、吕观仁：《渤海国志长编（外九种）》，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952 页。

⑬ 李兴盛、吕观仁：《渤海国志长编（外九种）》，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952 页。

⑭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 17《食货考》，长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 年，第 390 页。

二、由药方所见的渤海人医疗水平

针对病痛的治理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判断指标之一。随着渤海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进步,其医疗也逐渐发展起来。早在渤海人之前,此地的勿吉人就会制药,《魏书·勿吉传》记载:“常七八月造毒药傅箭镞,射禽兽,中者便死。煮药毒气亦能杀人”。^①利用毒药置于武器之上来捕猎或战争,可见渤海先民已经熟练掌握部分用药知识。另据《松漠纪闻》载,渤海“妇人皆悍妬(妒)……不容侧室及他游,闻则必谋置毒,死其所爱。”^②可见,渤海人会配置毒药,而且用于下毒。渤海有一种地产中药“含生草”,其功效被中原医书《证类本草》所收录:“含生草,主妇人难产,口中含之,立产……生靺鞨国。”^③靺鞨、鞞鞨,皆是渤海国的主体民族靺鞨的异写。^④从这种渤海国地产中药被发现,到传播到中原,再被中原记录下来,无疑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可见渤海国的一些独特地产中药的药性早就被中原地区所关注,并对其医药产生影响。

据《杜阳杂编》记载: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贡火玉三斗及松风石……上嘉其光洁,遂处于仙台秘府,以和药饵”。^⑤唐朝把渤海国进贡的火玉、松风石当作药引子,可见渤海国进贡地产中药引子同样对唐朝医药产生了影响。因此,无论是渤海国的地产中药材还是药引子都“反映出渤、唐医药交流中渤海医药学对唐朝的影响”。^⑥

渤海人生活在古代中国的东北地区,气候十分寒冷,在此居住的渤海人与东亚地区其他民族或国家相比,生活上常常面临着更多的困难,所以渤海人不得不与周边建立贸易关系,以弥补自己某些生产、生活物资上的匮乏,输入医药产品就是其对外贸易的重要动因。

日本对渤海国使团输出药品的律令细则《延喜式·典药寮》中记载:“素女丸半剂、五香丸三两、练仲丸、吴茱萸丸、干姜丸、犀角丸、四味理中丸各一剂,七气丸、八味理中丸各二剂,大戟丸半剂,度嶂散、百毒散各二剂,茯苓散三剂,黄良膏、升麻膏各一剂,神明膏二剂,万病膏三剂,所需药物亦依本方。”^⑦延长五年(927年),日本律令正式规定渤海国使团可以在其境内直接采购17种药品,这说明渤海国与日本医药交易早已经出现,最终以日方制定律令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渤、日药品贸易有序进行。通过统计日方对渤海国输出的中成药和方剂共有17种,除度嶂散、练仲丸两种药名或佚名或失传外,其余的15种药名均能在辽代及其以前中医古籍中找到医用来源,且这些药名今天依然被沿用。按照唐朝中医学分科法^⑧,可把这15种药品进行分类(见表1、表2、表3、表4):

① 《魏书》卷100《勿吉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220页。

② 吕观仁、梁燕:《秋笈余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8页。

③ [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9,《含生草》,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年,第274页。

④ 苗威:《大祚荣族属新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3期,第81-92页。

⑤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杜阳杂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6页。

⑥ 胡梧挺:《“含生草”与“靺鞨”:渤海国相关史料的讨论》,《哈尔滨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4-8页。

⑦ [日]藤原时平、藤原忠平:《延喜式》卷37《典药寮》,延长五年(927)十二月廿六日条。

⑧ 中国的中医医学分科始于周朝,到唐朝时期出现的医学教育机构“太医署”,下设医学部和药学部。医学部设置四大科,即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医科之下又设有“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小”(儿科)、“耳目口齿”(五官科)和“角法”(拔火罐等外治法)五种专业,各专业又分别规定了学习的年限和所习教材,可见其分科设置之细。

表 1 内科药品

品名	组成	功能主治	来源
五香丸	香附、丁香、木香等	消化化痞,宽胸止痛	《千金方》卷 6《五香丸》
吴茱萸丸	吴茱萸、橘皮、附子	抑制肠内异常发酵,镇吐,镇痛效能	《外台秘要》卷 7《吴茱萸丸》
七气丸	乌头、大黄、紫菀等	用于七气积聚,坚大如杯等	《千金方》卷 17《七气丸》
百毒散	狼毒、川槿皮、独角莲等	用于中蛊毒	《肘后备急方》卷 7《百毒散》
茯苓散	赤茯苓、羚羊角、人参等	用于健脾消肿	《圣惠方》卷 45《茯苓散》
四味理中丸	人参、增红曲	主治脚气	《百一选方》卷 11《四味理中丸》
干姜丸	干姜、白茯苓、人参等	主治室女经水过多,连绵不绝	《圣惠方》卷 42《干姜丸》
素女丸	茯苓、菖蒲、栝楼根、菟丝子等	针对房事所伤而引起的性功能障碍,具有补益、壮阳	《外台秘要》卷 17《素女丸》

表 2 外科药品

品名	组成	功能主治	来源
黄良膏	细辛、大黄、当归等	用于疥疮等	《圣惠方》卷 65《黄良膏》
升麻膏	川升麻、犀角屑、玄参、麻黄、等	主治一切毒肿热疼	《千金方》卷 22《升麻膏》
万病膏	川乌、草乌、大黄、乌药等	用于跌打损伤,消瘀散毒,舒筋活血,止痛接骨	《金匱要略》卷 88《万病膏》

表 3 儿科药品

品名	组成	功能主治	来源
八味理中丸	人参、甘草、白术等	主治小儿心肺不和,息数脉急等症	《百一选方》卷 2《八味理中丸》
大戟丸	大戟、葫芦巴、麝香等	用于小儿心膈伏热生涎,霍乱烦闷,身体多热,吐逆不定	《圣惠方》卷 58《大戟丸》
犀角丸	犀角屑、当归、川大黄、巴豆等	主治小儿脏腑壅滞,腹肋妨闷,大便不通	《圣惠方》卷 92《犀角丸》

表 4 五官科药品

品名	组成	功能主治	来源
神明膏	蜀椒、吴茱萸、前胡等	用于一切疾风赤痒,耳聋疮肿	《外台秘要》卷 31《神明膏》

通过以上 4 个分科列表可知:其一,渤海国可以在日本采购的药品中,涉及内科、外科、儿科、五官科,主要是治疗消化化痞、月经不调、男性功能障碍、镇吐、产后中风、中蛊毒、健脾消肿、心胸烦热、疥疮、毒肿、跌打损伤、小儿心肺不和、耳聋疮肿等疾病,可见其采购药品种类、治疗范围很广;其二,通过药品的组成及功能主治内容可以发现,日、渤药品的配比及使用都有明确的中医处方出处;其三,根据以上列表,可以推断出渤海国使团中有医匠或者至少有知晓中成药和方剂用法与功效的人跟随,按科分类采购所需药品,也说明了相关药方的使用在东亚地区药品交流中已经达成共识。^①

三、渤海国对于药事的管理

渤海国存国 229 年,被誉为“海东盛国”,其制度基本上是效仿唐朝的制度而来的,不论是其中枢部门三省、六部、十二司,还是地方的府、州、县等,对于王国内各项事业也均有自己的管理部门。

^① [韩]朴峻亨、吕寅硕:《〈大同类聚方〉典药寮本和古代韩半岛相关的处方》,《简牍与文字》2015 年第 15 卷,第 223—285 页。

(一)从渤海国官职设置上看

渤海国的中枢机构部门“义部”相当于唐朝的礼部,主要掌管其礼仪、祭祀、贡举之事,下设义部司和膳部司,其中义部司是专门管理王国的礼乐、图书、天文、医药之事,而膳部司是专门掌管祭祀、酒膳、朝聘之事。^① 因此,渤海国对内有“义部司”专门管理其医药事业,对外则有“膳部司”组织其与周边国家或民族开展贸易、宗教、留学等活动,且每次对外活动皆由其高级官员带队并管理其贸易、留学、采购书籍等,对外药品贸易交流同样也受其管理。因此,渤海国很可能是在与周边的交流中,把医书、医疗技术、医药人员带回渤海国,也有可能是渤海国官方所请,或是中原地区及医药发达地区赐予渤海国医书并派专业的医疗技术人员,直接促进了其医药的发展。

在其中枢机构管理部门中,有专门管理宫廷事物的“殿中司”和“太常寺”等类似于唐朝的专门管理宫廷医药的机构,其长官属从三品的职务,与中正台、宗属寺、文籍院、司宾寺、大农寺、巷伯局等同列。^② 其中“殿中司”掌管渤海国宫廷“尚药”,“太常寺”掌管渤海国宫廷“太医”,因此,渤海国在其核心部门宫廷及六部中皆设有医药管理机构,分别掌管宫廷和王国的医药事务,证明渤海国十分重视对医药的管理。

(二)从疫病流行的角度来看

渤海国为加强中原地区的联系,先后开辟了朝贡道、契丹道、营州道,这三条路主要是对中原地区的交通线,^③都经过当时渤海国主要经济以及人口密集区域的上京、中京、东京等京、府、州。其交通线的开辟,一方面繁荣了渤海沿线城镇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加,加速了“海东盛国”时代的到来;另一方面,在渤海与中原地区,尤其是黄河以北区域内,流行性疫病的滋生空间场域较大,疫病通过其交通线上的人员、物品等传播到不容易控制地区的可能性也随之加大。

渤海国时期(698—926),中原多次发生疫病,根据张志斌的《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统计,当时共有 16 次较大规模的疫病流行,平均每 14 年就有一次较大疫情出现,在全国及北方地区就曾爆发过 4 次较大规模的疫病流行^④(见表 5)。

表 5 渤海国时期(698—926)出现疫情统计表

时间	影响范围	记载文献
705—710	全国性:水旱疾疫,六年之间,三祸为变	《新唐书》卷 118《辛替否传》
707	北方地区:山东、河北 ^⑤ 二十余州旱,饥饉疾疫死者数千计	《旧唐书》卷 7《中宗纪》
762	全国性:迨至德之后,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饥疠	《旧唐书》卷 118《杨炎传》
788	全国性:又疠疫水旱,户口减耗,刺史析卢,张虚数以宽责朱泚平,天下户口三耗	《新唐书》卷 52《食货志二》

其二

从表 5 可知,水旱灾害过后紧接着就会有大的疫情出现,从 705 到 788 年间,中原地区受到疫情的影响,尤其是山东、河北等地区为重灾区。然而,流行病的发展是继续流行,高死亡率的疫在当时是反复出现,且南北方均有,涉及的府、州、县等行政区域非常广,这些疫病流行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疫病流行规律所致。正如余新忠所言:“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同样的疫病在熟悉它并具有免疫力的人群中流行与在完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中爆发,其后果差别巨大”。^⑥ 因此,渤海人在面对流

① 魏国忠、朱国忱、郝庆云:《渤海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04—309页。

② 魏国忠、朱国忱、郝庆云:《渤海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07—309页。

③ 梁玉多:《渤海国经济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2—121页。

④ 张志斌:《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第160—165页。

⑤ 渤海国所在的忽汗州都督府处于河北道北部。

⑥ [美]威廉·H·麦克尼尔著:《瘟疫与人》,余新忠:《译序》,余新忠、毕会成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

行性疫情时,发展医药事业是其维持生存的选择,同时发展医药事业可以提高其人口的成活率,对于渤海国当权者来说人口关系到其租税、徭役、兵役的来源,影响其自身实力的发展。总之,从渤海国官职设置及其自身发展考虑,发展医药事业是其必然的选择。

四、渤海国中药在与周边国家交流中所起到的作用

渤海国通过其交通线,与周边国家及地区进行了多领域的交流,尤其与中原王朝及日本之间的交流较为频繁。渤海国的对外交流,既有地区或国家之间的政治考虑,也有其经济的需求,其向中原及日本各地区皆派有使臣,凭借本地的特产,维系着与周边的贸易关系,中药贸易交流就是其中一项。

首先,以中药为媒介向中原王朝进行朝贡。渤海国的地产中药,不仅对本地的医药发展及其贸易有很大推动作用,而且也影响着东亚地区的医药发展。渤海国向中原王朝进贡地产中药是很频繁的事情。据《册府元龟》记载: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渤海遣使献……昆布”。^①同光元年(923年)“渤海国王大諲譔遣使裴璆贡人参、昆布、黄明。”^②天成元年(926年)“渤海王大諲譔遣使大陈林等一百一十六人朝贡进见……人参、昆布、白附子。”^③可见渤海多次以其地产中药朝贡中原,中药在当时双方朝贡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渤海朝贡使皆由其统治者派遣且朝贡团队的规模大、等级较高,说明渤海重视向中原王朝进贡中药。

其次,与契丹的中药贸易。契丹是东北地区的重要古代民族,收集情报是契丹取得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据《辽史》记载,“必先料其虚实,可攻次第而后进兵”,^④正是由于契丹重视周边各种情报工作,才使得其对外战争顺利展开。在东北地区,契丹对于曾是其对手的渤海国境内的各种土特产及贸易情况,包括后来在其原疆域内的其他民族情况是一清二楚,据《契丹国志》记载:“次东南至五节度熟女真部族……所产人参、白附子、天南星、茯苓、松子、猪苓、白布等物”。^⑤“又次东南至熟女真国……不与契丹争战,或居民等自意相率贡以……天南星、人参、白附子、松子、蜜等诸物,入贡北番”。^⑥因此,从契丹所记载的熟女真的特产可知,契丹对其部族的物产、贸易情况、与外界关系等均有调查,尤其是在原渤海国域内的熟女真部的地产中药及贸易情况做了详细的记载,表明从10世纪初契丹灭渤海国之后,此地的中药贸易还是依然在进行,没有因渤海国灭亡而中断中药贸易的往来,其地产中药作为当地的土特产已经被历朝的统治阶层和百姓所知晓并接纳,地产中药交易已经成为此地的常态;另外,也说明此地盛产中药,中药贸易是对外交流的重要物资。

再次,与日本的中药贸易。中药不仅是用于治病救人的处方药材,也是东亚地区药品交流中互通有无的必需品,通过对渤海国与东亚地区药品贸易情况进行检索,可以发现在与其药品贸易的另一端点日本,在其平安时代中期制定的律令实施细则《延喜式》中就有关于渤海国使团在日本采购中药的详细律令:“草药,八十种。练胡麻大五升,桃仁一斗四升,黄芩、莽莛、黄连、白术、石斛、蓝漆、细辛、桔梗、独活、当归、夜干、牛膝、茯苓、白芝、升麻、橘皮、附子、乌头、天雄、黄耆、松脂、石南草、防己、黄蘗、白藜、紫苑、麦门冬、苦参、鬼臼、芎藭、干地黄、织实、葛根各二斤,芍药、地榆、前胡、

① 《册府元龟》卷 971《外臣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 11411 页。

② 《册府元龟》卷 972《外臣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 11421 页。

③ 《册府元龟》卷 997《外臣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 11421 页。

④ 《辽史》卷 34《兵制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 398 页。

⑤ 《契丹国志》卷 22《太祖大圣皇帝》,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 236 页。

⑥ 《契丹国志》卷 22《太祖大圣皇帝》,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 237 页。

白头公、栝楼、防风、柴胡、茵草、商陆、大戟、茵芋、菖蒲、藁本、甘遂、石苇、泽泻、玄参、漏芦、藜蘆、蛇衔、梨芦、桑根白皮、皂荚、丹参、蒲黄、半夏、龙胆各一斤,龙骨、石硫黄、石膏各一斤,蜀椒四斤,吴茱萸五升,升麻、杏仁、五味子、菟丝子、葶苈子、蛇床子各二升,乌梅、大枣、麴各五升,瓜蒂四升,羚羊角十枚,熟艾二斤,仆奈、女青各一斤,盛杂药韩柜二合,著鏃。裹柜席四枚,黑葛二斤,麻绳八了,枘二枚,裹药庸布二段,笥二合,各方一尺五寸。纸八张,木绵三两。”^①因此,从律令细则可知,渤海国使团在与日本进行药品贸易时,有多种药材可以在日本购得,其中也包括了裹药布、纸张、绵等医疗用品,这表明其对医药用品等有很大的需求,有些还需从外部输入;另外,日本对渤海国采购药品种类给出了详细列表及规定范围,表明其对于渤海国采购药品的重视,也说明了双方已经对中药及医疗用品有统一的标准及认知,这些方面都有利于双方对彼此相关中药乃至物产方面的了解及交流。^②总之,渤海国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中药交流中,一是输出其地产药,二是输入其需求药;这些不仅促进了其自身的中药开发及医疗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与外界的相互了解。

五、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社会文化,还是从科技医疗,渤海国都是一个比较先进的地方民族政权。早在其先民阶段,渤海人就懂得利用其地动植物及矿物资源来治疗疾病、生产打猎及进行战争等活动,从侧面体现并促进了其医药发展状况。到渤海建国存续期间,渤海人已经不仅会使用中药,还将特产中药用于朝贡中原王朝及从事海外贸易,而且设置了仿效唐朝的医疗机构,对于东北地区医药事业的发展以及东亚地区中医药文化圈的发展和扩大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探究渤海国药事进步的原因,除了其自身是多民族国家以及原有土著既有的医药基础等原因之外,主要还是渤海人具有开放的民族意识,这种开放的民族思想意识,推动渤海人不断地把唐朝及周边先进的医药知识、药事管理等经验引进来,直接促进其药事的发展与进步。

[责任编辑:张京梅]

① [日]藤原时平、藤原忠平:《延喜式》卷37《典药寮》,延长五年(927)十二月廿六日条。

② [日]小岛芳孝:《渤海的产业和物流》,《亚细亚游学》6,《特集·渤海与古代东亚》,东京:勉诚出版,1999年,第65—81页。

On the Cause of the Legal Rescission of Contract in the Korean Civil Law

YU Wu-ding, YIN Kui-jie, BIAN Hui-juan(27)

Abstract: In the Korean Civil Law, there are two kinds of reasons for the legal rescission of the contract. Firstly, the reasons for rescission of agreement stipulated in Article 543 (1) of the Korean Civil Law, and secondly, the legal reasons for rescission stipulated in Article 544 (delay in performance), 545 (Periodic Act) and 546 (Impossibility of Performance) of the Korean Civil Law.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the “non-performance of debts” system of the Korean Civil Law and the general view of the civil law community, when a refusal to perform, incomplete performance or delay in the receipt of creditors occurs, a party to a contract may also remedy the above situation by removing the contract. However, since the occurrence of “non-performance of debts” in Korean law presupposes the existence of a cause that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debtor, when something that cannot be imputed to the debtor occurs, creditors will not be able to remedy contracts that are no longer necessary for further performance by way of rescission of the con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Korea can adopt the “relief approach” of Anglo-American law system and regard “fundamental breach” as the only criterion to judge whether a contract needs to be terminated, and no longer consider whether there is any imputation to be attributable to the debtor, so as to better realize the function and value of the contract termination system.

Key words: Korean Civil Law; contract; statutory relief

An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 Chinese Medicine of Bohai

MIAO Wei, ZHAO Zhen-cheng(36)

Abstract: The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and the Japanese literature have a large number of medical materials in Bohai.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se data, it is found that the medicine culture of Bohai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medical culture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The prescription and use of the medicine have a clear influence on the Central Plains medicine. It shows that Bohai’s medicine industry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and it is one of the striking cases of “constitution of China”.

Key words: Bohai state; medicine; Central Plains

A Study on the “Three Function” of the Manchu Hsieh-Ho Hui

NAN Long-ru(45)

Abstract: The Manchu Hsieh-Ho Hui (Manchuria Concordia Associat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uling system of Manchuguo. Its three major functions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objectives of the colonial authorities in various periods of hypocrisy. The Manchu Hsieh-Ho Hui had played a role in stabilizing colonial rule in the Japanese-occupied areas and disrupting the people’s fighting spirit against Japan. Its function propagated to the public th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of the Japanese and puppet authorities, and demanded the people of Northeast China to make sacrifices for it. It also organized and mobilized the people, as the colonial authority’s conspirators and accomplices.

Key words: Manchu Hsieh-Ho Hui; pacification efforts; propaganda,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of the peopl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subjectivity” in the Chinese Complex of Ancient Korean Poetics

ZHANG Zhen-ting, ZHANG Chao(52)

Abstract: Korea’s ancient poetics is inherently closely related to ancient Chinese poetics in its